

预期的作用和对反垄断政策的启示

吴汉洪，王 成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对与其决策相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动值所作的估计或判断。在经济学中，预期主要包括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其不仅影响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也影响政府决策的结果。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已有大量关于预期的研究，但在反垄断政策领域，预期还未受到广泛重视。本文借鉴预期在宏观经济学中的研究成果，提出了预期的作用及其对反垄断政策的若干启示：第一，反垄断政策是政府与经营主体之间的博弈，在理性预期下，政府存在背弃诺言的激励，因而最优控制理论并不适用于经济计划。第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面临是遵守规则还是相机抉择的取舍，两种选择分别体现出原则性和灵活性，政府应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第三，政府的政策信誉对反垄断政策的执行效果至关重要，时间不一致的政府政策将会损害其信誉，建立政府的政策信誉比政策本身更为重要。第四，预期管理对反垄断政策是重要的，西方国家的预期管理在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笔者认为，与宏观经济学重视对预期的研究相一致，对预期的研究或将成为反垄断政策领域至关重要的一环，充分理解、研究和有效运用预期，对于政府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市场活力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预期；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反垄断政策

中图分类号：F03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3)12-0031-10

一、预期的含义和理论发展

经济学中的预期通常是指经济当事人对与其决策相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动值所作的估计或判断^[1]。其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现象，主要基于对过去经验的观察、推断以及对环境和情境的理解，从而影响人们的决策、行动和情绪。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预期强调主观性，不能与决策者分离而独立存在。其次，当事人预期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应该是一个概率分布。常见的预期主要分为两种：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

（一）适应性预期

适应性预期^[2]可以被简明地表达为：

$$E_t x_{t+1} = \sum_{i=0}^{\infty} \lambda(1-\lambda)^i x_{t-i} \quad (1)$$

其中，E表示预期，t表示时间，x表示目标预期值， $\lambda(0 < \lambda < 1)$ 表示加权系数，该系数呈

收稿日期：2023-09-30

作者简介：吴汉洪（1957-），男，广西崇左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组织理论、竞争政策分析和反垄断等方面的研究。E-mail: wuhanhong@126.com

王 成（1991-），男，山东枣庄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组织理论和政府规制等方面的研究。E-mail: 189812721@qq.com

几何级数下降。方程 (1) 的含义是：在 t 期预期的某一变量 x ，其在 $t + 1$ 期的值是过去所有值 x_{t-1} 的加权平均数。将方程 (1) 改写为：

$$E_t x_{t+1} = E_{t-1} x_t + \lambda(x_t - E_{t-1} x_t) \quad (2)$$

方程 (2) 的含义是： t 期预期 $t + 1$ 期的 x 值，等于 $t - 1$ 期预期 t 期的 x 值，加上该误差的一个调整。由于 $t - 1$ 期和 t 期预期的差额等于系数 λ 乘以 $t - 1$ 期的预测误差，因此，适应性预期亦被称为认识误差。

适应性预期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卡根在 1956 年提出。1957 年，弗里德曼在研究消费函数时，将适应性预期作为持久性收入假说的前提。1958 年，纳洛夫在分析农业部门的供给动态时同样运用了适应性预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关于宏观经济学和通货膨胀的研究中，适应性预期被广泛应用。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末，适应性预期很少受到挑战，尤其是在涉及通货膨胀以及预期的研究中，适应性预期被广泛运用，其原因主要有三点^[2]：

其一，误差认识是传统推断统计学在适应性预期中的应用，是利用现在的信息重新处理过去的推断。

其二，适应性预期容易被应用于实证研究。诞生于 1954 年的科伊克转换公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该式描述了如何将含有无法观察到的预期变量等式转化为可观察到的预期变量等式，具体可表示如下：

$$y_t = \alpha + \beta E_t x_{t+1} \quad (3)$$

其中， y 表示 x 期望值的函数， α 和 β 都表示常数，可以由回归模型估计得出。将方程 (3) 代入方程 (1) 和方程 (2) 可以消除不能观察到的 x 的预期值，从而得到：

$$Y_t = \alpha\lambda + \beta\lambda x_t + (1 - \lambda)y_t \quad (4)$$

方程 (3) 可以用来估计 α 和 β ，以及预期调整系数的值，使经济学家能够把不可观察的预期变量模型化。

其三，适应性预期假说有效性强。由于方程 (4) 的广泛应用， α 、 β 和 λ 的值的获得性亦得到提高。

(二) 理性预期

适应性预期虽在学术界风靡一时，但该理论自身的局限性使其逐渐让位于理性预期。Muth^[3] 在 1960 年对适应性预期提出三点质疑：第一，适应性预期成立的前提条件为，研究者能够对“其一次差是一级移动平均数的变量”提供无偏的、均方差最小的期望值。不过大多数变量难以满足这一条件，因此，传统的统计推断缺乏可靠性。第二，适应性预期与自然率假说相矛盾，由于后者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根深蒂固的理论地位，学术界不得不对适应性预期加以修正。第三，与适应性预期相比，理性预期不仅在逻辑上更有吸引力，而且在应用研究中更易于计算和推演，并具备一系列其他优势。

Muth 最初提出理性预期是为了揭示收入随机过程中的限制因素，以解释在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中包含的分布滞后公式。理性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为了避免损失和谋取最大利益，会设法利用一切可以取得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动状况作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鉴于理性人会利用所有可用的信息形成预期，Muth 以蛛网模型为基础，引入了一个带有理性预期的方程^[3]，具体如下：

$$Q_t^d = a - bp \quad (5)$$

$$Q_t^s = C + dp_t^s + u_t \quad (6)$$

$$P_t^* = E(p_t | I_{t-1}) \quad (7)$$

式中， Q 表示需求， P (p) 表示价格， I 表示信息， t 表示时间，上标 d 、 s 和 $*$ 分别表示需

求、供给和预期。 u_t 表示随机变量,衡量不可预测的因素导致的产量变化。 $E(p_t|I_{t-1})$ 表示利用 $t-1$ 期信息预测的第 t 期价格的期望值。从定义和方程可以看出,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假设市场参与者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调整其预测,以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而后者假设市场参与者具有完全的信息和理性的决策能力,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经济变化。

在理性预期的研究中,Muth强调,信息是稀缺的,当事人在经济系统中通常不会浪费信息;预期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对经济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理解;公众的预期不会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产生实质性影响(除非以内部信息为基础)。理性预期意味着:第一,理性预期是最准确的预期,是当事人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结果。第二,理性预期不要求每个人的预期都准确,也不保证每个人的预期都相同,但其误差平均为零^[3]。

Lucas^[4]将Muth的理性预期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此前,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在适应性预期的框架下,曾指出菲利普斯曲线中的通货膨胀与产出不存在长期替代关系,货币政策不具有长期产出效应。而Lucas基于理性预期认为,二者即使是在短期也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此后,Lucas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进一步阐述了理性预期,并将其引入宏观经济模型,丰富了理性预期的理论体系,至此,以Lucas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逐渐形成。

Lucas和Prescott^[5]在1971年所做的工作可用于政策研究,他们阐释了理性预期作为均衡概念的性质,并将理论与实证研究联系起来,构建了描述性参数(描述偏好、技术以及冲击过程的参数)与时间序列中可观察的顺序总体矩的直接映射关系。该模型反映了产业资本变动和产出价格的随机过程,并对该随机过程与经济计量学的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1980年,基于Lucas-Prescott的线性方程,Sargent和Hansen^[6]提出了一种改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以用于估计理性预期模型。其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更符合实际情况的理性预期模型,使经济学家能够更准确地分析和预测经济走势。这一工作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理性预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在政策建议上,理性预期的相关研究遇到逻辑困难。Sargent^[7]与Sargent和Wallace^[8]曾经讨论过这一难题。一方面,在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中,未来影响现在的途径是多元的,而达到均衡状态需要同时决定当前事件的结果和未来事件的概率分布,正是由于这种同时性,使得模型很难对政策提出有益的建议。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对理性预期的研究中,政府对于改变均衡结果起到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在货币经济学领域,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更加充分。另一方面,诞生于1982年的Kydland-Prescott模型认为,最理想的均衡状态是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此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理性预期模型。迄今为止,理性预期仍占据主导地位。鉴于此,在本文后文,如不做特别说明,预期均指理性预期。^①

二、预期对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影响

经济当事人必须作出的多数决定都涉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任何意在模拟人类行为的经济模型都会涉及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经济变量的预期^[9]。预期涉及到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如家庭(或个人)、企业的行为和政府的决策等。如果经济学的研究必然要涉及人类行为,那么对于人类预期的研究将是不可或缺的。基于此,下文将简要阐述预期对经济当事人行为的作用。

(一) 预期与个体经济行为

个体经济行为是指作为生产、分配、消费主体的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经常性的决策倾向,以及对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变化的有目的的反应^[10],其包括个体消费行为和个体就业行为。

^① 根据《金融学大辞典》^[1],预期还可分为静态预期和外推型预期。静态预期是在蛛网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用以考察价格变化对下一周期产量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均衡变化;外推型预期是在静态预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不仅关注经济变量的以往水平,还要考虑其未来的变化趋势。静态预期和外推型预期都不能说明理性预期的发展脉络,故列于脚注。

1. 预期影响个体消费行为

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性收入假说表明, 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是由其持久收入决定的, 而非凯恩斯认为的现期收入。持久收入是可预期到的未来收入的加权平均, 时间越近, 权重越大; 反之亦然。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基础上, Hall^[11] 提出了随机行走假说:

$$C_t = \frac{1}{T} (A_0 + \sum_{\tau=1}^T E_t Y_\tau) \quad (8)$$

其中, τ 表示时间, A_0 表示初始财富, C_t 表示第 t 期消费, Y_τ 表示第 τ 期收入, T 表示总期数。由方程 (8) 可知, 经济个体第 n 期的消费不仅取决于其初始财富, 还取决于第 n 期经济个体对其全部收入的预期, 即经济个体将根据预测收入尽可能地平滑消费, 其每期的消费是其预期的终生资源的 $1/T$ 。

Modigliani 和 Miller^[12] 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也同样表明, 理性的消费者将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安排终生的消费和储蓄。由此可见, 消费并非仅取决于现期的收入, 还取决于其终生的全部收入的预期。

2. 预期影响个体就业行为

就业预期包括很多方面, 例如, 就业地和工作环境、单位性质和岗位、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及发展前景等。劳动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是基于其自身竞争力和就业环境所作出的。对收入预期较高的劳动者会花费更多时间择业, 而对收入预期较低的劳动者则更容易满足, 也能更快地找到工作。如果给予劳动者的收入未达到其可接受的最低点, 劳动者会选择放弃工作^[13]。

根据劳动力市场机制, 当雇主察觉实际工资下降时, 其会选择增加雇佣劳动者, 而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尚未及时调整自身的价格预期。由于普遍相信货币工资提高将意味着较高的实际工资水平, 劳动者更倾向于主动寻求就业机会。相反地, 当实际工资增加时, 许多雇主选择减少雇佣劳动者, 从而导致就业率下降。基于这一事实, 预期对就业行为产生了影响^[14]。

政府的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个人预期来影响就业。例如, 当某地区被列为国家级新区时, 劳动者预期该地区发展前景良好, 将更有动力前往该地区就业。若某国政府实施高福利的社会政策, 一部分人可能预期到即使不工作也能得到一定的物质保障, 其就业动机就会下降。

(二) 预期与企业经济行为

企业经济活动主要包括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两类, 其均受预期的影响。由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 企业经常不得不依赖于各种信息和分析方法来预测各种经济变量的未来趋势。这些预期不仅包括对经济因素、市场需求和行业竞争态势的预测, 还包括对政策变化、技术创新和社会趋势等因素的预测。

1. 预期影响企业投资

凯恩斯认为, 预期会影响企业的计划投资。对未来盈利悲观的企业会削减支出, 对未来盈利乐观的企业会增加支出。在计划投资中有一部分属于自主性投资, 其被不稳定的、外生的波动所支配, 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 与产出、利率等变量无关。企业投资函数^[15] 为:

$$I = \bar{I} - dr_t \quad (9)$$

其中, I 表示计划投资, \bar{I} 表示自主性投资, r_t 表示实际利率, d 表示投资对实际利率的响应程度。方程 (9) 表明, 计划投资与企业乐观情绪 (隐含在自主性投资中) 正相关, 与实际利率负相关。企业乐观情绪受诸多因素影响, 例如, 政府计划颁布一项投资税收减免政策, 这一政策有望对企业预期产生重大影响, 从而推动企业增加投资。当预期到未来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经营收益将更为可观时, 企业也会倾向于增加投资。可见, 企业的投资行为与预期息息相关。

2. 预期影响企业经营

企业的预期反映在其决策中, 当企业预期未来产品价格会更高时, 其会倾向于增加生产和库

存,以求在未来获得更高的利润,而对产量增长的预期则会促使企业同时提高价格和产量^[16]。如果企业预期未来生产要素的价格会上涨,其会在价格上涨前增加生产要素的购入量。

评级机构对企业绩效的预期与企业的创新投入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具体而言,评级机构对企业绩效预期越高,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的可能性越大^[17]。另外,行业发展预期也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在长期期和成熟期行业中,行业发展预期与企业创新动力呈正相关关系;而在衰退期行业中,行业发展预期与企业创新呈负相关关系^[18]。

政府发文和政策动向对企业预期及其决策产生影响。例如,2021年,商务部等17个部门联合发文部署一系列丰富农村消费市场的措施,包括“开发适合农村市场的消费品”“优化农村生活服务供给”“提升县域文旅服务功能”等。其可能会改变企业对市场需求和市场环境的预期,进而决定企业产品经营和广告宣传的方向。

三、理性预期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在宏观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宏观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在学术上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Rational Expectation Revolution),其领导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纽约大学的萨金特、哈佛大学的巴罗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贝麦克鲁姆。本文着重考察理性预期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即在说明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的基础上,考察政策评估的卢卡斯批判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一) 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

米什金^[19]认为,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理性预期使用了包括政府相关政策等所有可以获取的信息。如果家庭和企业获知政府未来极有可能调整政策,其在预期中会考虑这一信息。例如,如果消费者认为政府即将推出一项个人所得税削减政策,那么即便在减税真正实施之前,其也可能增加消费。

其二,只有新的信息会导致预期改变。如果人们已经预期到某一信息,则该信息的公开不会对预期产生任何影响,只有那些未被预期到的信息的公开才会影响预期。例如,人们已经预期到政府会出台减税政策,那么该政策出台对预期不会产生影响。但如果信息表明,减税的幅度会更大,那么人们就会预期到其可支配收入将增加。

其三,如果某经济变量的调整规则发生了改变,其预期形成的方式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例如,假设一国央行的政策利率设定在很低的水平,且该国央行既定政策会使政策利率回归到正常水平,那么按照最优预期,利率会上升。但是如果央行既定政策发生变化,当政策利率较低并持续保持低位,此时,关于未来政策利率的理性预期就认为利率将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利率的变化导致未来关于政策利率的预期发生了变化。

理性预期是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强调市场参与者在作出决策时所使用的重要信息,以及这些预期是如何影响市场行为和经济变量的。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理性预期通常被用来解释通货膨胀、市场波动和经济周期。同时,理性预期也是制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和反应,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二) 卢卡斯批判对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经济学家主要使用宏观经济模型来预期经济活动和评估政策的潜在影响。简单地说,模型是描述经济变量之间统计关系的方程组。经济学家将数据输入这些模型,并得出关于经济活动的预测,用以评价不同政策产生的效果。

Lucas^[20]于1976年对当时评估政策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出了严重质疑,他认为,经济学家可利用的唯一科学的数量评估,是比较可供选择的政策规则的后果。就可供选择的经济政

策的后果而言, 模拟基本上不能提供有用的信息。通过说明典型经济计量模型中所使用的方程的性质, Lucas^[20]指出, 目前的做法是先估算出经济计量关系式(如消费系数), 然后在可选择的收入方案下, 利用这种关系式预测消费行为。其隐含的假定是, 在不同的方案下, 经济计量关系式保持不变。Lucas^[20]认为, 这一假定是错误的, 即人们只能期待模型中的行为方程随方案变化而变化。

经济计量模型方程组中的行为方程发生变化, 是因为当事人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而改变了自己的预期方案。如果能用某种系统的方式描述出经济环境, 计量经济学家就有希望运用经济理论预测出经济当事人将如何行事。但是, 如果当事人发现经济环境是随机的、混乱的, 计量经济学家将无法有效地解释当事人的行为。

卢卡斯批判对合理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意义深远。由于政策制定者预期不到新的和不同的经济政策对模型参数的影响, 利用原有模型模拟的结果就不能用于预测其他政策体系。不仅如此, 建立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卢卡斯批判使学术界重新反思曾流行一时的、用最优化控制理论制定和评价政策的做法。

(三) 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对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

在经济政策领域, 若政策制定者对未来行为无任何承诺, 他们就是在相机抉择(Discretion), 即根据实际情况判定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政策。Kydland和Prescott^[21]提出了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分析了相机抉择的潜在缺陷。

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是指, 在制定短期决策时, 政府具有背离长期最优计划的倾向。Kydland和Prescott^[21]认为, 尽管最优化控制理论被证实在自然科学领域是非常有用的, 但在理性预期的假设下, 最优化控制理论却无法适用于经济计划。在社会经济系统中, 存在着那些试图预期政府政策的有智慧的当事人。在情况给定的条件下, 政策制定者(政府)采用相机抉择的策略介入动态经济系统, 并不能确保社会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其原因在于, 经济计划并不是针对物理系统的控制手段, 而是政策制定者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博弈。Kydland和Prescott认为^[21], 如果经济当事人是前瞻性的, 政府规制就以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一个动态博弈的形式出现。假设政府制定了其所认为的最优政策, 然后将该政策下发给私人部门, 如果私人部门相信该项政策, 那么在随后的时期, 该政策也许不再是最优的, 因为在新的情况下, 政府有违背诺言的激励。这种事先和事后最优政策的差异就是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具体地, 如果在T时期得出一项最优政策, 而在T+N时期得到另一个不同的最优政策, 那么在T时期估计的最优政策就是时间不一致的。Kydland和Prescott证明了具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政策将极大地损害政府的信誉。

Kydland和Prescott的研究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 几乎使人们放弃了建立在最优化控制理论基础上的政策设计方案和政策评价方法。如果说卢卡斯批判只是从模型参数变化的角度对传统的政策理论提出疑问, 那么, Kydland和Prescott的研究则更明确地表明, 社会经济系统完全不同于物理系统, 因而对物理系统有效的最优化控制理论并不一定对社会经济系统有效。

其二, 明确地把经济政策问题强调为是理性当事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博弈问题。因此, 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基本工具不再是最优化控制理论而是博弈论。

其三, 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研究表明, 如果政府能改变其政策, 那么政策本身也会是时间不一致的, 建立政府的政策信誉比具体的政策本身更为重要。

其四, 对政府信誉的分析被引入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西方学者认为, 建立良好的政策信誉是政府避免时间不一致性的最重要的手段, 因而,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大量信誉模型, 讨论政府信誉对政策施加约束的可能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理论。

四、启示

鉴于预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而将预期分析融入反垄断政策领域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可以提高相关模型的解释力,而且也应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鉴于此,本文借鉴预期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作用,论述预期对反垄断政策的启示。

(一) 反垄断政策是政府与经营主体之间的博弈

作为微观经济政策的一种,反垄断政策是国家为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而制定的一系列规则。反垄断政策通常是以一国的反垄断相关法律为基础。以中国为例,2008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标志着中国反垄断政策的正式落地,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许多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政府调控经济的方式与操控一台机器截然不同。事实上,经济的运行依赖于有头脑、有思想的当事人的行为选择。根据卢卡斯批判,如果当事人具有理性预期,那么认为政府用经济政策来调控经济就像控制一部机器那样简单是完全错误的。鉴于此,用最优控制理论来设计和评价政策的做法便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该思想同样可以运用于解释反垄断问题。把竞争监管问题视为博弈问题最重要的启示是,监管者(政府)和被监管者(企业)从主动被动关系转变为策略互动关系,尤其是被监管者不一定永远处于被动地位,而是有偏好、有目标、有策略的理性当事人。在反垄断政策领域,博弈最显著的特征是,其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竞争监管者的行为,还同时取决于被监管者的行为。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这一情况。对政府来说,在实施反垄断政策时,如果忽略了企业对政策的预期,或无视企业基于政策预期所采用的策略,就有可能使反垄断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

(二) 反垄断政策面临遵守规则还是相机抉择的取舍

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争论为,货币政策是应当按照规则实施还是应由中央银行(货币当局)相机抉择实施。遵守规则的支持者以货币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为代表,相机抉择的支持者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遵守规则的支持者认为,货币政策具有自动稳定器的特点。特别地,在控制货币供给时,中央银行被要求遵循一套简单的、事先设定的和公开宣布的规则。而相机抉择的支持者认为,中央银行应当自由地选择策略,以促进该国经济保持稳定的通货膨胀、较高的经济增长和较低的失业率。

从表面上看,法律条文是明确和固定的,反垄断政策的执行似乎是“照章办事”,体现的是原则性,但其实不然。第一,政策由政府的相关人员来实施,而人都有偏好、心理和情感。同一个垄断案经由不同的人来审理,结果就有可能不同。更何况,一个涉嫌垄断的商业行为可能存在很多商业性、技术性和社会性的背景和因素,很难用法律条文作出非黑即白的明确判断。第二,如同很多经济政策一样,反垄断政策在实际执行时,也有严厉和宽松之分。以规范数字经济为例,政府在不充分了解数字经济的竞争、发展和运作的规律之前,不应盲目采取规范措施。在不同国家,数字经济规范的标准常常存在差异性。如果规范过于严格,以至于持续对某些企业进行处罚,将会对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规范过于宽松,尽管数字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可能会损害消费者或潜在进入者的利益。

鉴于此,反垄断政策的执行客观上也存在着宽和严、松和紧之分,从竞争市场上看则是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市场活力主要由企业的活力来反映和体现;市场秩序则是企业在进入、退出及交易过程中共同遵循的规则,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状态和格局。市场得以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活而有序”,即市场既有活力,也有秩序。作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重要手段,反垄断政策从本质上说是政府对企业施加的约束和规范,属于政府微观经济干预的范畴。在现实经济活动中

经常会看到两种极端的情况：要么市场很活跃，但存在一定的违法、违规活动；要么政府严格规范市场秩序，但市场不活跃。前者可能顾及的是在总体不失序的情况下保持市场活力，后者则以规范市场秩序为着眼点。

对理性的经济当事人（企业）来说，市场规制是宽松还是严苛一般都可以被感知到，并据此形成对市场的预期，进而选择相应的市场行为。对政府来说，其执法活动不仅要努力保持市场的竞争秩序，更重要的是向企业传递如下信息：作为市场竞争中的仲裁人，政府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任何破坏竞争规则的企业都将受到惩罚。这些信息会影响到企业对市场的预期，引导其调整市场行为。

经济学理论表明，市场活力有利有弊，市场秩序（及其维持）既有收益也有成本。这意味着，反垄断政策应该努力在市场活力和市场秩序上寻求平衡。理想的市场竞争监管应该是有效监管，其特征是松紧适度、宽严适中，既要防止市场竞争监管过于宽松、流于形式，也要防止因监管过于严苛而使企业丧失发展活力。

（三）政府的政策信誉对反垄断政策是重要的

美国学者 Kydland 和 Prescott^[22] 证明，具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政府政策会损害其信誉。此后，对政府信誉的分析被引入到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理论，而将该问题引入反垄断政策研究领域，则可视为对政府信誉分析的拓展和延伸。

反垄断政策的基础是一国的反垄断法律，从一定意义上说，反垄断法律是一国市场竞争的规则。建立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的分析表明，如果政府能改变其政策（即规则没有约束力），那么规则本身也会具有时间不一致性。一般地，政府的反垄断执法可能会犯两类错误：一是“假阳性”，即误判，把市场上某一企业合理的商业行为错误地认定为垄断行为；二是“假阴性”，即漏判，把市场某一企业的损害竞争的垄断行为错误地认定为合法的商业行为。显然，这两类错误的发生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反垄断执法的公信力，进而影响政府的政策信誉，其后果的严重性理应引起政府的重视。

（四）预期管理对反垄断政策是重要的

预期管理是指政府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引导公众预期向相关政策目标靠拢，从而提高政策实施效率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预期管理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客观地说，西方国家的预期管理在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已有大量理论和经验研究对此进行了讨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政府日益重视预期管理。“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改善与市场的沟通，增强可预期性和透明度”；“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健全宏观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重视预期管理和引导”。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先后提及要加强预期管理。

笔者认为，预期管理在反垄断政策领域同样重要。反垄断政策的当事人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前者是市场竞争的仲裁人，后者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和参与者。当市场竞争主体因竞争产生纠纷时，需要政府依据反垄断法律以及相关事实和依据对竞争纠纷作出裁决。显然，为了提高反垄断政策的实施效率和更好地实现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目标，政府应该加强与企业的信息沟通。特别地，应及时和明确地告知企业反垄断法律所规定的市场竞争规则，其重要之处在于能够引导企业的预期向反垄断政策的目标靠拢。为了有效地引导市场预期，政府可以制定预期管理规划，积极引导企业预期的变化，从而达到既定的经济目标。考虑到预期的重要作用，规划的制定必须全面考虑企业的预期状况和变化趋势，以确保企业在预期形成前、形成中和形成后均与社会的经济目标相一致。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很难形成良好的预期。若企业认为政策只是短期的，则可能缺乏对政策的积极反应，只有当企业认识到政策是长期性的时候，才能形成政府所期望的心理预期，从而使政策发挥应有的效果^[23]。

当前,中国各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在大力推进反垄断合规指引,这是预期管理在反垄断政策领域的一个有益尝试。以北京市为例,2023年9月7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北京市反垄断合规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是中国目前篇幅最长、内容最全面的反垄断合规指引。该《指引》全面涵盖了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和行政垄断相关的主要规定,为各类主体提供了教科书级别的合规指引。政府依据该《指引》能够实现一定的预期管理,这对提高中国反垄断政策的透明度以及提高政府反垄断执法的可信度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政府完善反垄断合规制度,为企业全面构建反垄断知识体系提供了明确、系统的指导和参考。

参考文献:

- [1] 李扬.金融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197-200.
- [2]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21-22.
- [3] MUTH J F. Optimal properties of exponentially weighted forecast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60, 55(290): 299-306.
- [4] LUCAS J R.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2, 4(2): 103-124.
- [5] LUCAS J R, PRESCOTT E C.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J]. Econometrica, 1971, 39(5): 659-680.
- [6] SARGENT T J, HANSEN L P. Formulating and estimating dynamic linear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80, 2(1): 7-46.
- [7] SARGENT T J. Autoregressions, expectations, and advic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 74(2): 408-414.
- [8] SARGENT T J, WALLACE N.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76, 2(2): 169-183.
- [9]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242.
- [10] 徐向艺,钟耕深,陈志军.个人经济行为与经济秩序[J].文史哲,1990(3):3-11.
- [11] HALL R 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6): 971-987.
- [12] MODIGLIANI F, MILLER M H.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48(3): 261-297.
- [13] 范皑皑,车莎莎.大学生的就业预期与就业选择[J].教育发展研究,2014,34(23):27-33.
- [14] 薛进军.合理预期理论述评[J].世界经济,1987(10):51-57.
- [15] 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王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381.
- [16] ENDERS Z, HÜNNEKES F, MÜLLER G. Firm expectations and economic activity[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22, 20(6): 2396-2439.
- [17] 蒋樟生.市场预期对制造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构关注和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9, 41(11): 57-69.
- [18] 廖金叶.行业发展预期、盈利水平与企业创新动力[J].财会通讯, 2022(12): 73-77.
- [19] 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宏观经济学:政策与实践[M].杨澄宇,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391.
- [20] LUCAS J R.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C]//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elsevier.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76: 19-46.
- [21] KYDLAND F E, PRESCOTT E C.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85(3): 473-491.
- [22] KYDLAND F E, PRESCOTT E C.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J]. Econometrica, 1982, 50(6): 1345-1370.
- [23] 江世银.社会预期管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81.

Role of Expect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ntitrust Policies

WU Han-hong, WANG C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ummary: Antitrust policy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 crucial strategy for maintaining market competition in China. However, the antitrust rules implemented in China over the years have largely focused on mechanized enforcement,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This has resulted in difficulties in achieving the intended goals of government-issued rules. Expectations 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in-depth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macroeconomics, with systematic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However,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in antitrust policy has yet to be sufficiently explored and applied. In light of th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aning, categories, and role of expectations, and presents four insights on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i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This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antitrust policy.

Firstly, in the framework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re exist incentives for the government to break promises or tamper with previously announced policies. Therefore, optimal control theory, although proven highly useful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can not be applied to economic planning, and the game theory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tool in macroeconomic policy theory. Secondly, acting according to rules reflects principles, while exercising discretion reflects flexibility. Antitrust policy involves a balance between leniency and severity, reflec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vitality and orde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hould strive to seek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market vitality and market order while influencing the expectations and behavior of market participants through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Thirdly, the government's policy credibility is crucial for antitrust policy. Time inconsistency in government policies will undermine the credibility of policy enforcement. If the government can change its policies, the rules themselves will become time-inconsistent. Therefore, establishing credibility in rule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pecific rules themselves. Fourthly, expectation manag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ntitrust policy. Expectation manage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There has been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is topic. Since entering a new er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attached increasing importance to expectation management.

Similar to macroeconomics, a detailed study of expectations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e field of antitrust policy, providing significant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policymak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research direction will involve in depth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market vitality and market order, while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credibility and expectation management. The article posits that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study, and utilization of expectat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achieving economic goals, maintaining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promoting market vitality, and dri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expectations; adaptive expectation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titrust policy

(责任编辑: 徐雅雯)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3.12.003

[引用格式]吴汉洪,王成. 预期的作用和对反垄断政策的启示[J]. 财经问题研究,2023(12):31-40.